

引 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勤劳奋进的中华民族以其聪明才智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追根溯源，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自古以来，炎黄子孙就生息繁衍在黄河流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黄河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古代的黄河流域，由于肥沃的土地、温暖的气候以及充沛的水源，使得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发了向称发达的农业经济，农业也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存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先祖炎帝，就因为教民耕作，种植五谷，又亲尝百草，为民治病等等，被人们尊崇为农业之神，号称“神农氏”。因此从古代以来，不仅农业成为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有关农业科学技术的积累与总结也最丰富，农学更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对农业科学遗产的总结与传播，就成为那些不为名利、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社会贤达为之奋斗的不懈追求，贾思勰及其《齐民要

术》的撰写，无疑是其中的光辉典范。贾思勰在中国农学史上成为最著名的农学家之一，《齐民要术》也位列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首。这正如我国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先生《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一书中所称道的那样：《齐民要术》不仅是我国，而且也是全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最丰富的一部农业科学知识集成，是我国农业遗产宝库中的一颗灿烂明珠。

一 被历史湮没的生平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在生活与生产实践活动中所缔造成就的。但是在传统的史学中，被记述的却主要是帝王将相和达官贵人，广大劳动群众及其生产活动则极少得到反映。尤其是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统治者鄙夷、漠视自然科学技术，不仅使大量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得不到系统的整理和推广，而且那些热爱科学、为发展科学技术献身的杰出学者，十之八九也因此而得不到尊重，他们的姓名、身世、事迹等往往失传，在史籍中常常是仅留下一星半点的痕迹。北魏时代的山东籍大农学家贾思勰及其《齐民要术》，就遭到了这样的命运。

在被统治阶级所认可的“正史”中，不仅没有贾思勰的个人传记甚或只言片语，就是在其他同时代的史籍中，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因此，贾思勰虽然是中国农学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农学史上的知名人物，

下,经全体编撰人员呕心沥血,反复酝酿,认真研讨,几易其稿,终于出版面世了。

《齐鲁历史文化丛书》共 100 册,是一部气势恢宏、特点鲜明的鸿篇巨制。一是内容丰富。囊括了齐鲁历史文化长河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典籍以及具有典型意义的遗迹、遗物等等。二是脉络清楚。从齐鲁文化的源头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开始,到其发展繁荣的鼎盛时期春秋战国,再到秦汉之后两千年的繁衍传承,线索清晰,史料翔实,比较全面和系统。三是观点权威。荟萃了省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采纳了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了目前我国齐鲁文化研究的最高水平。四是可读性强。以广大干部群众为读者对象,最大限度地把学术成果通俗化,是学术走向民间的新尝试。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了解齐鲁文化,继承和弘扬齐鲁文化的思想精华,以史鉴今,咨政育人,面向未来,开拓创新,都将大有裨益。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学术研究永无止境。让我们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开辟齐鲁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新境界,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4 年 8 月

(一)出身于青州世族之家

在“贾思勰之谜”中，贾思勰的籍贯及其家世，曾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在传世的文献中，由唐代魏徵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最早著录了《齐民要术》一书。但是，由于贾思勰名不见经传，故《隋书·经籍志》在著录《齐民要术》时，也仅仅是简单地只注作者姓名，云“贾思勰撰”，而没有像著录其他文献那样，言明作者的里间、身世、时代及官职等等。此后宋代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也非常简单，仅说“贾思勰《齐民要术》十卷”而已。且从此以后的有关史志和官私书目，在收录《齐民要术》时，都只是依据《齐民要术》已有的题款“后魏高阳太守贾思勰撰”的字样，加以著录，而没有任何书录考察贾思勰生平事迹。

因此，贾思勰其人其事便湮没在历史之中，鲜为人知。一直到清朝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著录《齐民要术》时，也还是说贾思勰“始末未详，惟知其官为高平太守而已”的话。贾思勰的里籍、家世、生平等，便成为一个历史之谜。

为揭开贾思勰之谜，首先对贾思勰的生平事迹进行考察的，应该首推清代学者姚振宗。姚振宗

(1842—1906)，字海槎，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著名目录学家，他在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一书中，初步对贾思勰的籍贯进行了考证：认为贾思勰与《魏书》里的贾思伯、贾思同兄弟是同时同族之人，并且做过郡守之官，而贾思伯、贾思同兄弟在史籍中，被明确记载为“齐郡益都人”，所以贾思勰也应是齐郡益都人。

姚振宗的这一说法即出，之后便被有关史籍所承袭。加之后来人们又根据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 年）葛佑之《齐民要术》“后序”中，有“谨按《齐民要术》，旧多行于东州”等语，遂认定贾思勰的籍贯应属山东益都无疑。贾思勰是山东益都人之说便长期流传下来。

当然，要论定贾思勰是山东益都人，最主要的是要有充分的历史证据，要靠历史事实来说话。由于在历史文献中，诸如“正史”等有关史志，缺乏对贾思勰的相关记载，其他史籍的记载也付之阙如，所以要考定贾思勰的里籍，最主要的应是从贾思勰自己的著作《齐民要术》一书中，来寻绎有关的线索。因为《齐民要术》是贾思勰根据历史文献、自己的调查访问以及亲身实践经验撰写出来的，书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贾思勰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状况，展现地域特色，留下地域特点。

事实亦正是如此，如在《齐民要术》卷一《耕田

篇》中，贾思勰在转引汉代崔寔《政论》中有关犁耕的论述后即附注说：

现在济州以西地区，还在使用长辕犁、两脚耒。长辕犁耕平地还可以，在山谷之间就不好使了。而且转弯相当困难、费力，不如齐地人使用的蔚犁那样灵活轻便。两脚耒在种垄时太密了，也不如一脚耒合适。

这是贾思勰记述济州以西用耒犁和齐地人用耒犁不同的情形。当时的济州五郡之地包括今山东西北部地区，他在这里所说的“齐地人”，应当是指当时青、齐两州人说的。类似的说法在《齐民要术》中还有记载。如卷六《养牛、马、驴、骡篇》论治牛病，贾思勰转引《家政法》一书中“四月伐牛茭”一句时作注解：

四月的青草，与五谷类饲料没有区别，但是齐地人的习俗则是四月不收割牛草，损失真是太大了。

又如在卷八《黄衣、黄蒸及蘖篇》讲到“作黄衣法”时说：

齐地人喜欢对着风把黄衣扬去，真是大错特错。

这两处说的“齐地人”，与前面所引述的都是指青、齐两地而言。

因此，贾思勰在书中之所以屡次提到齐地人的风俗习惯，以“齐郡”“齐地”“青州”等地的物产、器物、种植加工方法等作为实例来论证问题，最主要的一点，说明了他应是当时青、齐地区的人，所以书中用他最熟悉的事物来作例证。否则的话，就难以解释这种情况。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四《种椒篇》中，在摘引文献中“蜀椒出产于武都”的记载时，有这样一段按语：

现在青州也种蜀椒。本来是有个商人做花椒买卖生意，因看到花椒中的黑色种子，于是就产生了种花椒的念头。他总共在地里撒了几千枚种子，才长出了一棵花椒苗。遂用这一棵花椒的种子培育繁殖。几年之后，就结出了很多花椒。这些花椒，籽实芬芳。它的香味、形状、颜色与蜀椒差不多，只是香辣味稍微弱点。于是分布栽种移植，几乎遍布了青州全境。

这是他记述青州种“蜀椒”的起源和“分布栽种遍州

境”的事实。虽然贾思勰所说的青州开始种蜀椒的具体年代未详，因其不见旧的文献记载，故其所讲“现在青州也种蜀椒”云云，应当是指他当时所亲眼看到的青州地区栽种花椒的情形。很明显，贾思勰的相关记述应是其亲眼目睹，至少也是本于乡里遗闻的。既然是亲眼目睹或者是本于乡里遗闻，当然就说明贾思勰应为当时的青州人。

在《齐民要术》卷四《种枣篇》中，贾思勰还有一段按语讲到：

青州出产一种乐氏枣，肉细核小，多汁，细腻，味道好，为天下第一。家乡父老们传说：乐氏枣是乐毅攻破齐国时，从燕国带来种下的。齐郡的西安、广饶两县所产的名枣就是乐氏枣。现在的名枣有陵裘枣，就是幪弄枣。

这是贾思勰记青州及其齐郡的名枣得种和栽种的来由，按语中说的“家乡父老”，应是指青州而言。青州齐郡是贾思勰时代的一个大郡，齐郡又为当时青州所领的首郡，所辖共九县：曰临淄、曰昌国、曰益都、曰盎阳、曰平昌、曰广饶、曰西安、曰安平、曰广川。按语中提到出产名枣的西安、广饶两县，就是齐郡所领属的县。这段按语中既云“家乡父老”，又云齐郡两县所产名枣，故可以进一步说明作者就是当

时的青州齐郡人。

尤其是在文化传播还不发达的时代，学术传承主要靠口耳相传，师生传授，因此也形成源远流长的学术流派，呈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在《齐民要术》卷十《五谷、果蓏、菜茹非中国物产者篇·葛蒲》一条的记事中，贾思勰就曾引《春秋传》杜预的解说。就其援引杜预的传注加以考证，这在南北朝时代，属于“南派经学”。

所谓“南派经学”，是与“北派经学”相对称的名称。南、北派是按照当时经学传行的地区来划分的。北派出于东汉郑玄，《春秋传》用《服虔注》。南派兴于魏晋，《春秋传》用《杜预注》，下传至南北朝时期。南派经学初行于南，而未及北。到北魏中叶，始传于北方地区的青齐之地。《北史·儒林传》所云“齐地多习之”的话，便是说明这时《春秋传·杜预注》在青齐地区传授的情形。因此就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所引传注而言，他应是一位学识丰富兼治南派经学的学者。由此亦可证贾思勰应生活于青齐地区。

另外在《魏书·贾思伯传》中也有这样的记载：贾思伯与弟贾思同年少时，兄弟俩曾共同拜青州经学大师北海郡人阴凤为师。阴凤为他们两人传授《杜氏春秋》。所以贾氏兄弟二人为官后，两人曾相继出任朝廷侍讲，同为北魏皇帝讲授《杜氏春秋》。贾思伯

先“授肃宗杜氏春秋”，贾思同复“授静帝杜氏春秋”，两人讲授的内容，也就是阴凤所传的《杜氏春秋》。因此，从“齐地多习”《杜预注》的情形来说，《齐民要术》所引传注，之所以引《春秋传·杜预注》而不引其他传注，就不是偶然的了。这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前引姚振宗关于贾思勰与贾斯伯、贾思同为同时、同宗、同族兄弟的考论。

同时，语言也是考订贾思勰里籍的一条途径。俗话说，人行千里，乡音难改。在《齐民要术》中，就会发现贾思勰不经意间，常常说出自己家乡的方言土语。如在《齐民要术》卷三《种胡荽篇》中，他就说：

在六月份阴雨连绵时，遗落在地里的芜荽种子便会自己长出来。

他称这一情形为“糴生”。据栾调甫先生考证，“糴生”一词是从先秦以来在山东地区流行的方言，而且“糴生”的“糴”字，原本有两个字形。山东西部地区读“糴”作“吕”音，“糴生”因此写作“稭生”；山东东部地区读“糴”作“鲁”音，便写作“糴生”。一直到近当代，“糴生”的“糴”还被读为两音。如寿光人就读“吕”音，桓台人就读“鲁”音。《齐民要术》一书中既然称“糴生”，因此据以可考证《齐

民要术》的作者，显然是与寿光语同一音系的。

因此，根据以上几条重要线索的考证，现学术界大都认同贾思勰为北魏青齐地区人。而且由于贾思勰与《魏书》里记载的贾思伯、贾思同兄弟，不仅都是“思”字辈，而且与他们俩人同时，所以从清朝学者姚振宗起，就推论贾思勰很可能与贾思伯、贾思同是同族的兄弟，迄今学界一般也都同意这个推测。根据《魏书·贾思伯传》记其为“齐郡益都人”，所以贾思勰应与贾思伯同为齐郡益都人。

正因为有这样的证据和考证，所以近代以来的许多著作，皆称贾思勰为山东益都即今山东青州市人。只是由于历史政区的变迁，贾思勰的里籍现在却并非属山东青州市，而是属今山东寿光市。

因为北魏时期的益都，不仅其界域一直延至今寿光境，而且益都县城也在今寿光城南。1973年在今山东寿光城西南四公里的李二村北的一座封土墓内，出土了一方墓志（现收藏在寿光博物馆），墓志首题“魏故散骑常侍尚书右仆射使持节镇东将军青州使君贾君墓志铭”，正文有“君讳思伯，字士休，齐郡益都县钓台里人也”等字句。这是求证贾氏家族里籍的一条重要的材料。

贾氏墓地既在今寿光城外，按当时仕宦人家大都族居城里的一般情形，从而推证贾氏的族居闾里则应在当时的寿光县城。其实早在元代，山东籍学者于钦

《齐乘》一书所记贾思伯的传记中，就有“今寿光南有墓碑”的记载。因此贾思勰的里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今山东寿光市。

那么，贾思勰的家世及其家族背景又是如何呢？对此学界也有不少推测。

从魏晋以来，高踞于社会上层且在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当时的门阀士族阶层。在北魏统治山东后，政治上也与青齐世族豪强势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采取以当地人为州郡官的做法，以获取各阶层的支持，加强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统治。尤其是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魏统治者更注重加强鲜卑贵族与汉族豪门的联合，大力推行鲜、汉联合统治的政策，极力扶植汉族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势力，给与汉族地主阶级种种特权，以稳固北魏在山东地区的统治。当时北魏统治者争取民心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任用青齐地区的世家豪族，担任朝廷中和地方上的高层官吏，因此在有关史籍记载中，青齐地区的许多世家豪族，便跻身于北魏统治层中，其中就包括青州贾氏之族。

据现有文献记载，在青州贾氏“思”字辈的排行中，就有不少达官显宦。如被学界考定为贾思勰同族兄弟的贾思伯（？—525），字士休，入仕后即连任太子步兵校尉、中书舍人、中书侍郎等职，为孝文帝所器重，常从师征伐四方。宣武帝时，转为辅国将军。后持节为军司马，从攻钟离（今安徽蚌埠市东），遇

雨失利，退兵殿后有功，继任河内、荥阳太守，颇有政绩。肃宗时，又历任太尉长史、廷尉卿、太常卿、度支尚书等职。受太保崔光推荐入宫，为肃宗侍讲《杜氏春秋》。并延招儒生，授经传业，谦虚谨慎，礼贤下士，颇得朝内外好评，是当时北魏颇有声望的一位官员。

贾思伯之弟贾思同（？—540 或 477—549），字士明，素习经史。初官彭城王国侍郎，后至荥阳太守、襄州刺史。孝庄帝时，任给事黄门侍郎，为青州大中正，授金紫光禄大夫等职。擢为侍讲，授孝静帝《杜氏春秋》。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上书难《杜氏春秋》63 事，贾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 11 条。孝静帝诏国学诸儒考证，事未竟而思同卒。这是一场在经学上同时也是在政治上的大辩论，总计前后一共延续达十五六年之久，成为北魏历史上的一桩历史公案。因此也就同时说明，贾思同为北魏时代青州益都的一位专精《杜氏春秋》而又兼通服氏之学的经学大师。

其实，从族系上来考察，也有线索说明贾思勰的身世背景。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序》，在叙及贾氏之祖时，记载了从三国时期魏太尉贾诩，下传 17 代至唐代的贾氏子孙，中间所记就有名贾宏、并“宏生勰”的字样。这里所记的“勰”，据考证可能就是“思勰”的单称。而在传世的贾思伯的碑文中，贾思伯的父祖辈中就有名“贾宏”的。尽管《新唐书·宰

相世系表》与传世的贾氏碑文，两者在世系上还很难一一对应起来，但是其所记的世系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从两晋以来，社会上就十分重视编修家谱，以确定诸家大族的宗支源流。如东晋南朝就有著名的谱学家贾弼之、贾渊等人。

另外在《北史·贾思伯传》中还记载，贾氏先祖为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其九世祖贾敷曾被任命为幽州刺史，赴任途中卒于广川（今河北枣强境内），他的子孙便在广川定居下来。到北魏天兴初年（约公元四世纪末），贾氏子孙中又有从广川徙至益都者，这就是贾思伯一族之支系。

所以，在《魏书》、魏碑中，除贾思伯、贾思同兄弟外，尚可见到不少贾氏宗人。如《魏书·傅永传》记有长史贾思祖，北魏敬使君碑有铠曹贾思庆，高齐西门豹祠堂碑有东郡贾思懿等等。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从年代上来说，贾思祖与贾思伯、贾思同兄弟同时（贾思伯卒于北魏孝昌元年，贾思同卒于东魏兴和二年），魏敬使君碑立于思同卒年，齐祠堂碑又在其后十年，以其同时和先后相接来说，“思”字确实为当时贾氏宗族的排行。所以《寿光县志》在引《魏书·贾思伯传》后附带提到贾思懿时便说：

贾思懿亦元魏人，与思伯、思同亦兄弟行。

又据《魏书·官氏志》的记载，北魏士族化政策最有力的倡导者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曾下诏，“分氏定族，料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贯”，颁布了士族标准。

北魏所划定的士族，主要是参考了魏晋旧门与本朝高官之法，大体上以官居三世以上、现任官职在五品以上者便定为士族。按照当时的这一标准，贾氏家族在北朝时期应是青州的世家大族，固无疑问。

但是到了北魏后期，由于山东、河北以及关陇等地相继发生的农民抗暴斗争，不仅瓦解了北魏的统治，而且也沉重打击了各地的豪门世族势力。如在山东地区，从孝文帝延兴初年到北魏灭亡的五六十一年中，就发生过 17 次农民起义。随着这些农民起义的相继爆发及其对当时世族地主阶级的打击，从此北方门阀世族势力就逐渐走向衰落，原来的一些著姓大族也就一蹶不振。贾氏家族也极有可能就随之落败了。

所以，在《齐民要术》中，我们看到作者有“我家过去饲养过羊二百头”、“晓示家童”等说法，皆或多或少地显示出贾氏家族，由原来的豪门世家逐渐衰败的某些迹象。尽管如此，说贾思勰出身于青州世族之家，应该大体上是可以断定的。

(二)关心民生的清廉太守

在“贾思勰之谜”中，贾思勰的生平事迹，包括他的生卒年代、社会交往、仕宦业绩等，也成为令人不易说清楚的问题，遂使后人对贾思勰的生平了解甚少。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除了《齐民要术》之外，贾思勰的生平没有多少可称道的。

其实，认真考察一下的话，除了贾思勰的千古之作《齐民要术》之外，虽说在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更多他的事迹，但贾思勰的一生，也绝非平凡的一生，这可以从他的仕宦生涯和学术生涯中寻得端倪。下面先从贾思勰的生活年代说起。

贾思勰是什么时代的人？或者说贾思勰的生卒年究竟是什么时间？这在“贾思勰之谜”中，也曾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

由于从《隋书·经籍志》到《新唐书·艺文志》等书目，皆在著录《齐民要术》一书时，没有言明其时代，仅云“贾思勰撰”，所以长期一段时间，贾思勰是何时人，便不为人所知，以致于南宋学者郑樵在其编撰的大作《通志·艺文略》中，竟误书贾思勰是东汉时期人。

大约从南宋人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才开始明确记载贾思勰的时代